

目 录

我从事华南民主运动的回忆	郭翹然 (1)
解放前广州市民盟的斗争史略	梅日新 刘貽虎 戴 蓉 (54)
合浦县学生运动记往	罗文洪 (58)
黄琪翔传略	场逸棠 (88)
郭冠杰传略.....	李伯球 郭翹然 李松庵 丘 挺 (134)
彭中英的一生	彭廷奎 庞 新 谢 炎 (152)
杨新伦的琴剑生涯.....	李松庵 李 涵 (164)
广东省铁路建设沿革述略	林秉芴 (198)
广州市橡胶行业史话	黄曦晖 (218)
六十年间私立广州培正中学的变迁	冼子恩 (259)

我从事华南民主运动的回忆

郭翹然

我参加华南民主运动，从开始之日起，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止，历时整整二十年。这二十年，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前仆后继，从黑夜战斗到天明的二十年。其间，我亲身所历、所见、所闻、所感，有足述者，爰志之，供史家参考。但恐事隔多年，错漏必多。为此，敢请有关同志，赐予指正，力求尽还本来面目于历史。同时，谨以此文，表示我对当年共同斗争的，或在解放前战斗中牺牲、或在解放后先后谢世的同志们亲切怀念。最后，本文初稿写出后，承李伯球同志提了许多宝贵意见，经分别吸取和校正，于此顺致谢意。

一、参加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前后

目睹广州起义

目睹广州起义，是我参加民主运动的动因之一。

一九二七年春，正当北伐战争乘胜前进、工农运动迅猛发展

之际，蒋介石背叛革命，发动“四·一二”大屠杀，使大好革命形势急转而为白色恐怖世界。

当蒋介石背叛之初，不少人对汪精卫仍抱有幻想。实则当时在国民党上层人物中，只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等极少数人，才是真正坚持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左派。汪在当年七月间，先在武汉“分共”，继则与蒋合流。至此，汪的反动面目，才再也无可掩饰地暴露于国人之前。

当时号称第二方面军的张发奎所部，随即离武汉南下。其先头部队叶（挺）、贺（龙）等抵南昌时，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实行起义（即“八一”南昌起义），并向潮汕进发。原拟占领汕头，利用汕头港口，接受国际援助，挽救革命。但终因时机和其他条件均远未成熟，因而经过沿途激战，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与秋收起义部队会师。事后据闻，当南昌起义部队到达潮汕时，坐镇广州掌握广东军政大权的李济深，曾命令姚雨平率舰队驰赴汕头堵击南昌起义部队和阻止苏联轮船进入汕头港口。但姚到达后，一炮未发。因而姚在返回广州后，即被李济深扣留。

南昌起义事发时，张发奎、黄琪翔、叶剑英等率部驻九江，闻讯后决定回师广东。当时李济深亦表示欢迎。

南昌起义后，国民党内部斗争亦加剧。孙科等串连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等实力派逼蒋下野。张发奎、黄琪翔、叶剑英等率部到达广州后，即以打倒桂系军阀为号召，先把李济深赶下台，并进占广西梧州。但当时张、黄、叶三位将领各有各的政治主张。张发奎依然心向汪精卫，黄琪翔拥护邓演达，叶剑英则坚决主张要走中国共产党所已指明的革命道路。在这时候，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正为开辟革命根据地 toward 井冈山进军。

当时我同一般青年一样，有为民族的复兴和祖国的强盛作出贡献的愿望和热情，向往革命，追求民主。但对我们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应该走那一条路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却是不明确的。当时我同第三党领导人邓演达的秘书丘学训和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秘书邓世标（共产党员）过从较密，见面时大家总要谈到时局问题。丘说当前必须继承孙中山的“三大政策”，邓则说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肩负领导中国革命的重担。当时我对丘、邓两位见解只笼统地认为两者都是反蒋的、革命的，因而都表示同情。

时局越来越动荡，广州更是如此。当时我住在小北小石街的一间二楼房子里。十二月十一日凌晨，我清晰地听见北较场传来的雄壮的国际歌声和阵阵响亮的革命口号声，我出楼探听，口号声渐渐停止下来，但继之而来的则是枪声大作。我情知有变，天一亮便和同住的邓琪通（少卿）一齐出去。行到公园前，见到许多工人在领枪枝子弹和红袖章、红领带，争先投入武装斗争。这才使我知道这是共产党发动的武装起义。我们继续前行，在财厅前见到第四军政治部代主任李世安，他对我说：“别再去，现在打仗”。于是我们便折返寓所。

当时由叶剑英的教导团、梁秉枢的警卫团和广州工人赤卫队组成的起义武装，在占领了市公安局和省府后宣布成立苏维埃，并决定以公安局为办公地址，又分兵向驻在长堤肇庆会馆的第四军军部和驻在文德路文德楼（其侧为大埔会馆）的十二师师部进攻。拿下肇庆会馆后，文德楼却久攻不下，于是改用火攻，遥望永汉路（即今之北京路）南段，浓烟直冒。经过一场激战后，市内敌军绝大部分已被起义军消灭。但就在此时，张（发奎）、黄（琪翔）所属的薛岳部队由江门直趋广州反扑，原盘踞在市区河南的李福林所部亦渡河向西堤一带猛袭，形势迅速逆转。张、黄部队

攻抵广州附近后，即向观音山（即越秀山）猛攻。义军坚守阵地，奋勇迎击来犯之敌。战至下午二时许，有一股敌军从大北门窜进公园前。其时，起义领导人张大雷同志适从西瓜园开会后乘车途经公园前回总指挥部，遭敌截击，壮烈牺牲。起义军与敌激战至十三日，终因四面被围，众寡悬殊，不得不向沙河撤退。张、黄部队攻入市区后，大肆屠杀，公园前、南关一带，洒遍了烈士的鲜血。从此曙光已露的广州，又为白色恐怖所笼罩。我亦不得不于当月二十日离广州经香港返梅县家乡。

我回到梅县，梅县的共产党人也在发动武装起义，建立苏维埃。当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是当地的中学教师钟贯鲁。结果亦因敌强我弱而失败。

当时作为有进步要求和民主愿望的青年，连续目睹起义的失败，其心情为如何，是不难想见的。

研 读 禁 书

在我去广州前，原在梅县家乡当小学校长。梅县侨胞众多，故文化教育较发达，虽地处山区，仍能得风气之先。从一九二五年国民革命军第一次东征部队师抵梅县（当时叶剑英同志任第二师参谋长兼梅县县长），继之周恩来同志亲来梅县之后，革命浪潮便高涨起来了。而我也在这时开始接受民族民主革命的影响。读《三民主义浅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并被派为国民党梅县第四区党部执行委员，开展以青年教师和学生群众为主力的反帝反封建运动，砸烂封建堡垒“团保局”和教会学校的牌额以及神庙的神牌，革命激流汹涌地冲刷着旧的思想，但在东征军回师广州，解决杨（希闵）、刘（震寰）的武装叛变时，梅县地区又为军阀陈炯明的部队所占领。他们一到来就同官僚地主紧密勾

结，血腥镇压民主运动，使得所有进步青年，几乎无法立足。我亦只好离梅去广州。

我到广州后，经余桂生（我的相邻）介绍，认识中大教授熊锐。当时熊正翻译《唯物史观》，他叫我帮他清稿，并拿了两本书给我，一为《共产主义ABC》（布哈林著），一为《中国青年的修养与训练》。就是这两本书，使我开始接触了革命理论。与此同时，熊还介绍我去以徐谦为校长的“广东法官学校”读书（当时熊锐兼任法官学校教授，他翻译的《唯物史观》即将脱稿，并由国光书店发出了预约券）。不幸，熊锐在广州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四·一五”大屠杀的一个深夜里被杀害。“法官学校”被搜查。我避走开平，直到暑期过后才重返广州，转读广州“法政专门学校”（后改为广州法学院）。

熊锐被害、“法官学校”被搜查，使我找寻光明之心更切。于是我又在读书期间，悄悄地读了日本河上肇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帝国主义铁蹄下的中国》、《资本主义的崩溃》、《社会发展史》等禁书。轰轰烈烈的广州起义，就是在我研读上述禁书时发生的。

一九二八年我再度由梅县家乡出来广州复学。一九二九年秋初，共产党人郭潜（我的学生）由港来信给我，约我同邓琪通（少卿）到港。我和邓依约前往，在香港皇家公园与郭潜会面。他同我们谈了中国革命前途问题。谈完后，他就问我们对共产主义有何意见。我们表示同情和向往。从此他就开始同我们联系。

我们由港回到广州半个月后，有一位姓廖（不知其名）的同志持郭潜的亲笔信来同我联系。此后每隔两星期，廖便来和我见一次面，并把党的油印刊物和文件交给我们。三个月后，廖就把参加共产党的申请表拿给我填。我和邓少卿立即填了表，介绍人是

郭潜(他后来叛变，成了叛徒)。这之后，廖还来过两次。但再后，廖便不见复来，亦无任何消息。我同郭潜的联系，也从此中断。

当廖同我联系期间，我正要在法学院毕业出校。就在此时，适逢警官学校招考。廖主张我们去应考，以备将来有所作用。结果我和邓琪通都考了进去(该校的招生简章规定，应考者以大专院校毕业者为限，毕业后以警官或分局长任用)。我因法专毕业在即而没有去读，邓却去了。邓在警校时，同一位姓夏的同学交情甚厚。邓赞赏对马列主义深有领会。每到星期天，邓必偕夏来我处见面。见面时又必谈革命。后来我才知道夏是共产党人，曾被捕下狱。他是湖南人，一九三〇年暑假回长沙，适红军攻打长沙，他将红军进城的盛况写信给邓，被警校查获，邓因而被捕，被认为是共产党人。

出走钦州

邓琪通被捕，我的处境也险象环生。当时我已在广州法学院毕业。为安全计，我便离开广州，到钦州去，在郭香石主持的田南陈报处当事务员，同时受钦州师范学校之聘为该校国文教师。我就在此时，与当时在钦县县府任秘书的李伯球开始相识的。其时钦县县长是黄嵩南(梅县人)。

当年中秋之夜，黄嵩南邀我等共同赏月。其间，我和李伯球曾就善恶有无客观标准问题进行了探讨，同感彼此观点，颇多值得继续钻研之处。直至散席，谈兴仍浓。次晨，伯球又来与我共谈“中国社会问题”。自此以后，彼此便推心置腹，引为知己。并准备共同筹建命名为“青矾社”的群众性团体和“青矾”书店，作为团结进步青年和开展民主运动的阵地。这时，我凭着钦州师范的岗位，除了经常向学生传播民主革命思想外，还邀请伯球来校给

学生作“中国社会问题”的演讲，对学生起了一定的启蒙教育作用。解放后钦县的党政干部，有不少是出自当时钦师的。此外，我还鼓励同学去广州读书，以开眼界。但在这个问题上，却发生了一件使我每一念及，就仍悲痛难已的事。这件事就是当时在钦师学习成绩较好而又倾向进步的学生中有温乔章和冯囊海两人要到广州去就读，不幸中途覆舟遇难。他们俩之死，罪在当地的“宾兴馆”。“宾兴馆”是当地土豪劣绅的顽固堡垒，负责管理鸦片烟土走私的税收。这笔款项，原指定为建筑钦县到合浦的公路费用的。但“宾兴馆”的豪绅们不建公路，而分赃自肥。因公路不通，致遭覆舟之祸（当时由钦州到北海只用风帆木船）。

黄嵩南、李伯球欲整顿县政，我被调去县府当教育科长。李伯球仍在县府任秘书。当时我和伯球满腔热情，幻想在县府进行一场改革，开创民主政治的局面。

在我接任教育科长时，“宾兴馆”就起来反对，向当时的省府控告，攻击我和李伯球的做法是“莫斯科”的做法。

一九三一年，由于蒋介石继扣留第八路军总指挥李济深之后，又复扣留当时因反对蒋介石当总统的立法院院长胡汉民，因而引起国民党内部分进一步陷入四分五裂的混乱局面。当胡被扣的消息传到广东时，在广州的国民党许多元老认为行政院长（当时蒋当行政院长）扣留立法院长，实属毁法乱纪，中外所无，纷纷表示愤慨，掀起了反蒋高潮。同时驻美公使伍朝枢亦下旗归国，表示对蒋扣胡的抗议，因而引起国际上的抨蒋舆论。一九三一年四月十三日，留在广东的国民党执监委邓泽如、林森、古应芬、肖佛成等，在广州举行国民党中央执监委非常会议，宣布成立国民政府，通电弹劾蒋介石。陈济棠、张发奎、李宗仁、白崇禧、唐生智乃至孙科和汪精卫等都起而响应。原任广东省府主席的陈铭

枢下台，陈济棠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林云陔任省府主席。在这形势下，我和李伯球便离开钦县来到广州。

陈济棠上台后，出于念旧，请他的老上司黄任寰出任独一师师长。我和李伯球到达广州后，组织“矛庐图书社”作为宣传民主、联系和团结青年的场所。当时伯球同志到第一集团军政治部，我到独一师（师长黄任寰）政治部去工作。

不久，“九·一八”事变发生，蒋介石下令不准东北守将抵抗，以致东北三省不战而陷入敌手。当时全国工农和爱国知识分子以及青年学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救亡运动，力促全国上下，一致对外，实行抗日，并提出宁粤和谈之议。这种形势，给了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以猛烈的冲击。蒋终于被迫在上海举行宁粤议和。粤方的条件是蒋立即下野，立即释放胡汉民、李济深，并任林森为国府主席，汪精卫为行政院长，撤销广州国民政府，撤销国民党中央执监委非常会议，改设西南政务委员会和国民党西南执行部于广州。同时为了保证粤方代表赴沪开会的安全，要求派十九路军开赴宁沪两地及其沿线驻守。宁方接受了粤方提出的全部条件，迫使蒋介石于当年十二月十五日国民党临时常委会议上提请辞去本兼各职，宣布下野（这是第二次下野）。当时蒋的下野，不仅是迫于国内形势，而且还迫于国际压力。如上所述，当蒋介石扣留胡汉民时，驻美公使伍朝枢愤然下旗归国的行动，引起美国朝野舆论哗然。而蒋是以美国为靠山的，美国当局的态度，蒋不能不有所考虑。但蒋的下野仍然不是真下野，而是以退为进的策略阴谋。实则蒋在他提出辞呈的当日，还亲自主持召开了一次行政院的国务会议，作出改组苏、浙、赣省府，改派他的亲信去当省府主席的决定。更其不得人心的，就是他在下野前夕，先下令枪杀邓演达。他之所以要杀害邓

演达，是因为他认为邓在黄埔军校及北伐战争中，深得各级军政人员和进步力量的爱戴，威望很高。蒋认为他自己一下野，取而代之者必为邓。若此时不除邓，他的以退为进的阴谋便不能实现。事实也正是如此，蒋下野不久，即于一九三二年三月以“汪蒋合作”的形式，重新上台，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掌握军事大权，推行“攘外须先安内”的反共反人民的政策。

参加第三党

第三党（即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创建和领导人邓演达的亲密同学（黄埔陆军小学第四期）郭冠杰于一九三〇年十月间，受当时的中山大学校长邹鲁之聘，来广州就任该校法学院院长。与此同时，郭又受第三党之派遣，在广州发展组织，积蓄力量，为继承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与背叛孙中山的蒋介石集团作斗争。

郭冠杰和我同是梅县丙村人，彼此相知有素。一九三一年五月，郭邀我参加第三党。当时我提出，中国革命已有中国共产党领导，既反对蒋介石国民党，但又不赞成中国共产党的路线和政策的党派是否有存在的必要和发展的可能？郭说，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为国共两党所拥护，而且邓先生（演达）是一贯主张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旗帜，邓先生有许多旧部，为了革命，为了推翻蒋介石，需要有人去做他们的工作。我颇然其说，并且认为当时第三党在自己的内部刊物《政治通告》中发表的对形势的估计，又正与我的愿望和想法相符。《通告》说：“在红军屡次胜利和外患日亟当中，各种反蒋势力亦只有随时增加，以致最后一切反蒋派别必然在共同的目标下形成反蒋的大联合。”于是我便加入了第三党。与我同时加入的，有李伯球和张育康等。其后伯球和我还参加了第

三党广东组织的领导工作。当时郭冠杰凭着他的反蒋的政治要求和他自己的声望，已在中大、工专、广雅中学、燕塘军校以及部分机关、部队吸收了百多名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和能起骨干作用的人士进来。当时同郭冠杰一起工作的有万灿、邓初民（均为中大教授）等。

第三党领导人邓演达被蒋杀害（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后，郭冠杰于沉痛哀悼之余，还经常邀集第三党同人聚集于其家中，追怀邓的勤奋好学，忠于革命，艰苦奋斗，坚贞不屈的政治家风范，以启同人。据闻，当邓被蒋杀害后，朱庆龄曾特为此亲到南京当面痛斥蒋介石。

二、福建人民政府成立与第三党解散

十九路军移驻福建

十九路军和第三党向有比较密切的关系。远在一九三一年八月间，蔡元培、邓演达、陈铭枢就在当时十九路军的驻在地江西吉安商定占领潮梅和闽南，实行武装割据，建立第三势力。只因“九·一八”事变发生，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同时复因八月间邓演达被蒋逮捕），全国人民呼吁一致对外，实行抗日，才使陈、蔡、邓三人的计划胎死腹中。

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发生后，十九路军不顾蒋介石的制止，挺身而出，英勇抗战，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支持和拥护，赢得了“民族英雄”的光荣称号。在十九路军轰轰烈烈的淞沪抗战中，第三党除了发动成员组织义勇队和后援队外，还发表了《上海事件紧急宣言》，提出十六条反蒋抗日纲领昭告国人。第三党领

领导人黄琪翔且曾亲率一批干部驰赴前线直接参与战斗。我亦闻风奋起，为组织群众，全力支援十九路军而奔走。

一九三二年五月，淞沪抗战终因蒋介石坚持不抵抗主义宣告结束。而坚持抗战的十九路军，却被调去福建“剿共”。蒋介石的反动和为计之毒，激起了十九路军的全体将士和全国进步人士的极大愤慨。历史教育了人。当时十九路军和第三党人共同认识到，要抗日就必须倒蒋，要倒蒋抗日，又必须先与共产党合作。

就在十九路军被迫移驻福建的同时，第三党鉴于蒋介石变本加厉地推行它的实质上是反共、反人民、反抗日的所谓“先安内后攘外”的反革命政策，第三党特派代表与西北冯玉祥将军共商抗日大计，并派遣一批成员参加冯组织的“察绥民众抗日同盟军”。从此就使第三党和冯的关系更加密切起来。

十九路军一到福建，陈铭枢、黄琪翔、李章达等就为此而分头进行准备。首先由十九路军派陈公培为代表，前往中央苏区联系。继之又派秘书长徐名鸿去瑞金，与中共签订“抗日反蒋同盟协定”。另一方面还派当时任福建省府秘书长的李章达密携蒋光鼎、蔡廷锴的联名信回两广与陈济棠、李宗仁签订“抗日反蒋合约”。联系就绪后，便以十九路军名义，邀请李济深、陈铭枢、黄琪翔、章伯钧、郭冠杰、徐谦、万灿、陈友仁及冯玉祥将军的代表余心清等到福建共举大事。于当年的十一月二十一日在福州召开群众大会，高举抗日反蒋旗帜，宣布成立“中华共和人民革命政府”，以李济深为人民政府主席。

第三党宣布解散

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后，第三党为了更有利于团结，促成全国抗日，由黄琪翔代表宣布解散第三党。从此黄琪翔与陈铭枢、李

济深、蔡廷锴等便开始拟议另行组织“生产党”。当时主张组党最力者为陈铭枢。其间曾经开过两次代表会议，但最终还是由于名称问题没有取得一致意见而组织不起来。其实问题并不在于名称，而在于用谁家的思想来指导。当时也正是在这点上，黄琪翔、陈铭枢他们，都同样受着难于逾越的阶级局限，而没有能够从最关重要的组织与领导问题上，把福建人民政府的事业推向前进。

十九路军被瓦解

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后，广东的陈济棠和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等，由于不满福建人民政府“联共”的主张，因而改变态度，表示不予支持。同时苏区又因受王明路线的影响，对福建人民政府采取冷漠的态度。而更主要的则是十九路军内部不纯，参谋处长范汉杰早已成了蒋介石的坐探。十九路军的一举一动，都悉在事先为蒋所知。蒋既派数倍于十九路军的兵力前来围攻，又事先收买了十九路军的部分将领，因而一经接触，就全面崩溃。当时我作为第三党的成员，带着联系和团结邓演达的旧部，共同为抗日反蒋而斗争的任务在黄任寰的独一师政治部工作，闻讯深为痛惜。

十九路军残部退到龙岩、古田一带，由广东陈济棠收编（派黄任寰负责其事）。收编时在古田谈判。蔡廷锴、黄强则在龙岩。黄任寰派他的参谋长曾举直为代表。在谈判过程中，蔡廷锴坚持要保存十九路军的番号，陈济棠不答应，坚持要编入他的第一集团军。当时蔡廷锴坚决拒绝陈济棠的条件，表示宁可上山。据说在此关键时刻，有这样的一段趣闻。就是黄强私下劝蔡（廷锴）说：“总司令，你的‘八字’叫做‘双龙出海格’，辰年辰时生，辰属龙。所以你凡是驻在有海口的地方，就兴旺。你在海口打邓

本殷起家，在上海抗日而得名，今你置身于山区之龙岩，而这龙岩又恰恰在古田之上。古者沽也，其兆不佳。因而还是忍让以待时，徐图再起为好”。蔡闻言，有所警动。便接受了陈济棠的条件，把十九路军残部，改编为第一集团军新编第一旅，由陈济棠派原十九路军军需处长黄和春任旅长。从此在我国的军队中，便再没有十九路军的番号了。但十九路军抗日有功，为民族长了志气，它的英名将长留青史。蒋介石也好，陈济棠也好，都抹煞不掉的。

当十九路军残部被收编为陈济棠的第一集团军第一旅时，李伯球曾想叫我去当这个旅的政治部主任。但事未成而陈济棠已先下令解散这个旅了。在收编时，有两事证明陈济棠也同蒋介石一样，对进步人士，是要斩尽杀绝的。他对十九路军的背信弃义，并不是偶然的。这两件事是我当时耳闻目睹的。一为徐名鸿被杀案：徐是十九路军政治部主任，福建人民政府漳龙省的副省长。他在十九路军被收编时，取道大埔先走，不料被大埔县政府查缉逮捕，终在陈济棠的命令下被杀害。蔡廷锴则由永定取道汕头赴港。徐被杀害后，大埔县府将徐名鸿的遗书报来独一师转报陈济棠，当独一师副官处长李某看到徐的遗书时，大叫：“好文章”。我即向李借阅，并将徐的遗书原文抄寄广州，借以揭露陈济棠的反动面目。遗书一是对十九路军说的，一是对其家人说的，因时间已久，我无法忆述其原文，只记其大意是：“十九路军因余而挫败，余今以身殉，亦可无愧以对十九路军矣！余死归葬汤坑，墓碑请蔡廷锴先生书之，文曰：社会主义者徐名鸿之墓。”至对其家人说的，我只记得开头两句：“国且难言，何有于家。今后苦吾××矣”（××是徐的爱人名字，我现已无法记及了）。当时我以为徐是第三党人，后才知道他与第三党没有组织关系。二为周力行

（即周士弟）的脱险：周是当时十九路军的一个团长，是在收编时装备和兵员都比较完整的一个团。他被收编缴械后毫无表示，泰然自若地住在独一师师部，每天都来政治部下围棋，下得很好，深为对手和观众所赞赏。后来黄任寰说要送他到大埔，然后由周自觅去路。行前送了五百元港币给周。走时周提出一个条件，要求把他原来骑的马，让他骑到大埔去。黄不以为意，答应了他。他一出门，就非常警惕。当时黄派了一班武装士兵送他走。出永定县城通向大埔的通道有一道桥，在过桥时，他看见送他的士兵所佩的襟臂章都是新的，因而心有所疑（原来这班士兵，是以连长扮成班长，班长扮成列兵组成的负责枪杀周力行的罪恶任务的凶手班），同时这班士兵又都没有带背包，他想既要送他到大埔，为什么又不带背包呢？由永定到大埔，并非朝出而能夕返的。他由此看出了杀机。于是他当机立断，先把黄任寰送给他的五百元港币，尽数分给这班的班长和士兵。行进时，他的前面有三、四个士兵，但这三、四个士兵，都不知道他们所负的任务。知道的只有伪班长一人。这时他骑着马越行越快，超越了前面的士兵。当行抵一个山湾时，他突然勒马破山而去。当伪班长只看见前面列兵，但不见周时，便惊问列兵，列兵均无以对，而遍询当地驻军，也都说不知周的去向。其实这时周已安全到达山背的白沙苏区了。周脱险后，黄任寰四处张贴通缉周的布告。事后我才知道，周原是第三党人。师部电务员告我：事前陈济棠曾电令黄任寰，要他就地处决周。黄任寰复电保周，认为周团是收编时最完好的一个团，而且周又服从缴械，如把他杀害，殊难见谅于世人，请免予处死。但陈再复电给黄，说如你认为不便，就把周解到广州来，由总部直接处理。于是黄便决定把周送到半路杀掉，以掩人耳目。

周力行脱险投身苏区后，我曾写了一篇题为《今日的“剿共”问题》的文章，在独一师的月刊上发表。文章议论了“剿共”部队不能抓捕离不开土地和耕具的农民，还谈到在政治制度不适应人民生活要求的时候，人民的思变情绪将随之产生等问题。刊出后，黄任寰看到这篇文章，认为这是政治问题，将危及独一师的地位。于是我便离开独一师，来广州就任由李洁之等人创办的实践中学校长。

三、中共《八一宣言》与第三党恢复组织

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委员会

福建人民政府失败后，原第三党的主要负责人，分散在日本和香港等地。一九三四年二月间，第三党在港的领导人黄琪翔、章伯钧、郭冠杰、丘哲等，根据各地成员的要求，连续举行了两次会议，作出了恢复第三党组织、按邓演达的纲领继续战斗的决议。并采取“分路进兵”的步骤，同时在国内进行活动。我拥护这个决议，因为这样做，有利于反蒋，有利于抗日。在此之前，李济深虽邀请章伯钧重新集结原福建人民政府的力量，共同组织新党。参与其事的陈铭枢主张组织“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第三党不同意。于是事情又以无结果而告终。这一情况深刻地表明，只有以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来指导中国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才能为当时所有主张抗日民主的各党派提供团结合作的理论基础和政治基础。

一九三五年入春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新的攻势，而蒋介石

石却继续推行他的反共媚日政策，使民族危机更趋严重。第三党同人和所有爱国志士，莫不忧愤交加，急求倒蒋抗日之道。

当年八月一日，中共发表了呼吁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八一宣言》。《宣言》照亮了民族解放的前途，充分表达了全国各族人民的迫切要求和愿望，也为三党同人指明了奋斗方向。在日本从事救亡运动的章伯钧等深受鼓舞，认为“倒蒋抗日，事可为矣”。同志们亦力促章伯钧等先返香港开展组织活动。当时在德国的黄琪翔闻讯亦飞函表示赞成，并指明“共产党是斗争的主力，要搞革命就必须与红军取得联系”。总之，斗争实践证明中共的正确，中共在斗争实践中赢得了全国各族人民和爱国民主党派的拥护。《八一宣言》为我国民族解放斗争开辟了新的历史时期。我在广州，亦为此而与吴仲禧等加紧联系，并先后邀请进步学者邓初民、肖隽英等到实践中学作“时事问题”和“中国社会问题”的讲演，为响应《八一宣言》进行宣传。

当年十月下旬，我赴港与先后从日本、华北等地抵港的章伯钧、李伯球、张云川、李士豪及原在港的彭泽民、丘哲、郭冠杰等会合，共商响应《八一宣言》和恢复组织活动问题。一致决定：（一）同共产党合作，以推动抗日为中心工作；（二）将第三党原来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名称改为“中华民族解放委员会”，以示同蒋介石国民党彻底决裂，与共产党同致力于民族解放斗争；（三）仍以邓演达领导时的纲领为基本纲领，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作相应的修改和补充，把原来对共产党的一些批评全部删除，并将过去所提的“建立反帝反封建平民政权”的政治口号改为“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以适应形势的发展；（四）原则上规定党的指导思想应以马列主义为依据。

上述决议，就为召开第三党的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作了思